本版编辑：张丹丹
E-mail：t2@studytimes.cn
Tel：010—62807315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下大气力来应对。

北欧、韩国的相关做法和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借鉴。

北欧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 张　燕

北欧国家人口老龄化形势较为严峻，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北欧五国目前总人口为2660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502万，所占比重约为18.9%。根据联合国有关指标，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超过14%是“老龄社会”，超过20%则是“超老龄社会”，北欧各国已处于“老龄社会”晚期。

北欧国家老龄化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北欧国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出现得比较早，在1980—1985年间，多数北欧国家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7个孩子，丹麦的这一数值甚至只有1.4。近年来，由于北欧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民众生育意愿有所回升，但仍低于2.1这一人口自然替代门槛线。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北欧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到2040年，80岁以上老年人在北欧人口中的占比将达到8.6%。

人口老龄化对北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各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呈逐年下降趋势，以芬兰为例，199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3.6%，2000年降至63%，2015年已降至60%。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导致用工成本不断攀升，增加了企业国际竞争压力，跨国企业纷纷将产能转移至海外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地区，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较为严重，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引起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自2010年以来，瑞典、芬兰、丹麦的抚养比以每年1%的速度上升，目前已达到30%左右，即平均约三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一个退休人口的支出。由于预期寿命增加，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接受医疗保健以及其他服务的时间显著增加。研究表明，芬兰的人均退休生活时间20世纪80年代为9年，2009年已经增加到20年以上，北欧模式又以“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保障著称，人口老龄化使北欧国家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受到极大冲击，国家财政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芬兰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63.1%，超过了欧盟规定的60%的警戒线。

为了有效应对老龄化冲击，北欧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改革养老保险体系。为缓解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北欧国家积极鼓励和促进个人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在确保国家养老金基础保障功能的同时，大力推动职业养老金发挥主导作用，鼓励个人自愿积累的养老金发挥补充作用，并更多地将养老金与个人一生中的总收入挂钩。

提供多样化养老服务。除了传统的居家养老、日间照料、24小时看护等养老服务外，北欧国家近年来探索了一些创新养老服务。首先是预防性养老服务。除传统医疗保健外，要求医生为老年就诊者设计有针对性的体育锻炼方案并跟踪评估实施效果；广泛推行老年人防摔倒宣传活动，并将上门挂窗帘、换灯泡等纳入市政服务体系，尽量降低老年人意外受伤几率。其次是监护居住服务。规划并建设一批以行动便利、安全易用为首要目的的老年住宅提供给老年人租住，配备无障碍设施和医疗监控、电子呼叫等设备，租户可随时请求上门护理服务。再次是互助养老服务。在社区建立互助养老中心，并提供一定资金帮助生活尚能自理的老人共同生活，相互照料。

改革养老护理照料体系。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老年人的护理和照料问题。在北欧的福利制度体系下，绝大部分所需资金来自中央拨款和地方政府税收，只有极少部分来自老年人的个人缴费。以瑞典为例，2014年养老护理照料支出总额约为127亿美元，其中仅4%来自个人缴费，与此相对应，传统上的北欧养老护理照料机构普遍为公立机构。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使公立机构改进服务，北欧国家近年来纷纷实行“养老券”制度，老年人持政府发放的服务代金券购买养老机构的服务，养老机构再凭代金券向政府领取资金。此举改变了政府预先向公立机构直接拨款导致其干好干坏一个样、没有竞争压力的局面，也为在相关行业中引入私营机构参与竞争创造了条件，目前瑞典私营机构所提供的居家养老服务已经占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

积极鼓励民众推迟退休。北欧各国将延迟退休视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为进一步保持社保缴费规模、降低支付压力，北欧各国近年来严格控制职工提前退休，取消了一系列原有的提前退休规定，并努力提高临近退休年龄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如挪威已明确禁止仅领取国家养老金者提前退休。芬兰则优化养老金计算规则，将63—67岁职工每年的养老金给付增长率调高到4.5%。

鼓励生育和吸收移民。北欧国家一直将提高生育率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其生育福利在全球居于前列。如瑞典规定新生儿父母共可享有16个月的带薪产假（双胞胎为22个月），休假时间分配由新生儿父母自行决定，政府每月为每个儿童发放1050瑞典克朗约合130美元的津贴，直至其年满16周岁为止。如家庭有多个子女，则还可额外获得多子女补贴，金额从每月1500瑞典克朗津贴至每月4144瑞典克朗不等。在丰厚的生育福利政策的刺激下，目前北欧国家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在1.65至1.85之间，虽均高于欧盟1.58的平均水平，但与2.1的人口自然替代率仍有差距。为此，北欧积极吸收移民。目前，瑞典987万人口中有167万是移民，丹麦和挪威人口中移民的占比也均在10%左右。

总体看，北欧各国应对老龄化冲击的各项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鉴于其55—64岁年龄段人口比例较高，超过欧洲平均水平，未来北欧老龄化进程仍将维持较高速度，将很快进入“超老龄社会”。各国所面临的压力将有增无减，仍需不断改革创新方能妥善应对。

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

□ 陆继锋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人口中的中老年人比重持续上升的过程。2009年，随着全世界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到7.5%，全球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韩国人口老龄化特点与面临的挑战

韩国正在处于老龄化社会和老龄社会交替之间，其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增幅大。据统计，1980—2015年间，韩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3.8%升至13.0%，增幅9.2个百分点；2015—205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从13.0%飙升至35.9%，增幅22.9个百分点。从进程看，韩国从老龄化社会到超老龄化社会仅用了27年。而这一进程，法国用了157年，英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89年。二是受城市化影响，农村老龄化问题突出。城市化影响了韩国人口的城乡分布，尤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进城热”使得农村劳动力大量入城，城市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90%以上且还在增加中，使得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

人口老龄化给韩国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一是经济方面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直接导致韩国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大，高龄就业人数增多，青年就业人数萎缩；受老年人储蓄能力不高的制约，银行储蓄力下降，影响了可用资金数量和投资额度。不断加重的养老负担制约了个人和家庭消费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尽管制造业不会受太大影响，但对服务业却产生了较大冲击，倒逼经济结构调整。韩国发展研究所预计，如不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2011—2020年韩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平均下降3.6%。二是产生社会问题。老年人要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削减家庭收入，增加了心理压力。近年来，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经济下滑的双重影响，老年人社会问题严重。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自2000年以来老年人自杀率增加了两倍多。人口老龄化增加了政府、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养老医疗支出，该项支出已经占到了韩国GDP的1/3；公共医疗支出年均增长都在11%以上。此外，受老龄化社会影响，韩国学校生源数量持续减少，部分学校招生困难甚至面临倒闭风险；参军适龄男性数量减少，危及国防建设。

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面临不断加剧的老龄化挑战，韩国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加以应对。

调整人口政策，提高人口出生率。上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实行了以“家庭计划”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控制政策；进入90年代后，政府认识到了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终止了控制生育政策。21世纪以来，政府开始鼓励甚至奖励生育，应对老龄化挑战。如实行杜绝堕胎政策，为不孕不育夫妇提供支援治疗费甚至体外受精手术费；为积极生产者提供带薪休假，上调产假职工工资；为减少子女养育费对生育率影响，减免费用、提供补贴、增设幼儿园数量；为减少房价对生育影响，为多子女家庭提供购买或租赁住宅优先权。政府甚至委派“托儿帮手”协助新生儿家庭解决困难并提供高额奖金。

发展老龄产业，促进产业转型。韩国大力发展“老龄亲和产业”，涉及护理、老年用品及器械、药品、殡葬等行业。为把握老年人需求，服务产业发展，韩国注重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每年都发布专门调查报告。政府出台了《老龄亲和产业振兴法》，责成保健福利部低生育老龄社会政策局和保健产业振兴院负责推动产业发展，财政部、劳动部等多部门积极参与，形成联动。政府还投入专门经费用于高龄产业产品研发。

促进老年人就业，缓解各方压力。在促进老年人就业方面，韩国政府可谓不遗余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出台了《高龄者雇佣促进法》；劳动部从1992年开始选定适合高龄者的职业并向社会公布；实施了高龄人职业能力开发支援项目和就业提高能力计划，仅隶属于劳动部的产业人力公团就经营近200家机构开展高龄者培训，自费学习者可获得学费补贴金。韩国视雇佣高龄者为企业义务，为雇佣较多高龄者企业发放补贴。为监督政策落实情况，政府要求企业每年都要提交报告，违反规定者将受到惩罚。

完善养老金制度，确保老有所养。上世纪60年代，韩国针对公务员、军人等特殊职业人员实施了养老金制度。此后，对教师、农民、渔民等群体也制定了养老金制度。政府、银行、生产企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个人等都积极参与养老金制度建设。政府先后推行了国民养老金计划、退休金计划、住宅养老方案、私人养老金计划等系列政策，构建了公私结合、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依托专门法规和机构，推动老年人工作。韩国政府制定了包括《老年人福利法》《老年长期疗养保险法》《低生率老龄社会基本法》等系列法规，确保老年工作有法可依。2005年，政府成立了由总统任委员长，多个中央部门长官参加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社会委员会，设立老龄社会和人口政策办公室。同时，针对不同需求设立相应机构。比如在就业方面，设有高龄人员人才银行、老年人俱乐部、老年人就业支援中心等机构。在文化活动方面设立了敬老堂、老年人福利馆、老年人教室等机构。

加强体验教育，增强社会理解和包容。为促进全社会对老龄化社会和老年人的关注，韩国一些学校开设了生活实践课程，让学生卧床体验老年人生活，学习照料老人；体验课程引入3D等高新技术，年轻人可直观感受视力衰退、手脚迟缓、触觉不灵敏等老年人状态。政府开设了专门培训，对象涉及医护人员、家庭护理员、赡养和福利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建筑设计师、老年人政策制定者等。首尔设有老年人模拟体验中心，民众穿戴身体束缚物模拟老人走路、吃饭等生活场景及腰酸背痛感觉，有利于让民众了解老年生活，从而弘扬敬老传统和孝道精神。

链　接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以2015年数据制作的全球老龄化图表：如图所示，2015年，全球只有日本一个年满及年逾60岁的国民占比至少30%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整个欧洲、澳洲和北美、南美多数、中亚和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均属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10%~30%的“第二梯队”。非洲、格陵兰岛、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老年人比例都低于10%。到2050年，中国、伊朗、加拿大、新西兰和欧洲大部地区都进入了日本所在的“第一梯队”，老年人占比至少30%。老年人占比不足10%的地区主要在非洲。





（上接1版）而之所以说它更基础，就在于文化本质的把握与阐明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前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在人们的精神实践领域获得信念扎根与牢固认同；之所以说它更广泛，就在于文化本质的把握与阐明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坚实地走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并获得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成为担当并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的历史进程；之所以说它更深厚，就在于文化本质的把握与阐明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具有延续并讲清楚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实践主体性和价值普遍性的文化能量和意义功能。

就此而论可以看到，首先，“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总体，是以文化这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为支撑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一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把握与意义建构，正是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制高点。

其次，“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创造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过程中和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实践为基础和本体，不断追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进行文化表达、价值创造和意义建构的历史成果。

其三，“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不断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地把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文化自觉与文化借鉴结合起来，不断开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卓越的文化高度的历史成果。

其四，“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还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就在于，它始终坚持以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源头和根脉，始终坚持以我们党和人民开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社会变革的伟大斗争孕育的革命文化为基础和依托，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孕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和主线，推动了中华文明、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不断焕发出新的蓬勃的文化生机与活力。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就在于它内涵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开启了中华民族最广阔的精神创造。

“四个自信”重要论述，从理想建构的高度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有理想和追求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理想和文化魅力的伟大事业。“四个自信”重要论述的提出，由于把文化自信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维度和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源泉，实际上也就从理想建构的高度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恒的文化魅力。

首先，“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古老理想的合理继承。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多年而不中断，以天人合一等为代表的理想境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文明一系列古老而维新的理想追求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紧密地连接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的社会意义与伦理网络之中，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包容力和转化力，成就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个人理想和人文精神。因此，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首先就是对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理想的继承与自信。

其次，“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更是对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承诺和现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昭示，确立了人类解放的永恒精神灯塔；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文化理想包括“翻身求解放”“建设新中国”“为人民服务”等，培育了亿万群众参加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激情、牺牲精神和道德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理想的自觉与倡导，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雄浑力量和辉煌前景。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丰满内核和连续谱系。

其三，“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还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把握和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心诚意。进入21世纪以来，时代变化和中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事业的新发展和遭遇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而且也需要我们在文化理想上实现新的充实和高瞻远瞩，通过面向并指向未来的“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当代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性和不合理性都视为“当下的东西”而收摄并涵化在中华民族和我们党的文化理想的视野和把握之中，从而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就表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远而务实的文化理想，并坚持以这一文化理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的、具体的文化创造与意义建构，坚持文化自信，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把握世界潮流，坚定地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始终不渝地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不仅将全面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恒魅力，而且也必将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美好、更为广阔的进步前景。

从“三个自信”迈向“四个自信”，是我们党总结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不懈奋斗的实践历程和历史经验的战略抉择，是立足当下并面向未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的总体性、主体性和普遍性的科学诠释与意义把握，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了一种更新、更高的整体自信水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构，正在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道，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迈向一种新的、具有总体性的话语表达和理论建构。